

上海的春天,空气中弥漫着花香。在这美好的春光里,我的儿子满30周岁,结婚了。对我来说,这是一个特别的时间,30年前,我嫁到上海郊区的一个小镇上,当时虽然已经结婚,但作为一个从山区来到大都市的外乡人依旧感到迷茫和无助,不知将会有怎样的生活境遇等待着我,是这座城市的包容接纳了我,让我融入于此成为了一名上海人。回首往事,这段人生旅途中的一幕幕情景,依然历历在目,感慨不已。

◆我从老家安徽九华山山脚下的小村庄,来到大都市打工,当时只想有一份工作赚钱,帮父母一起供养弟妹上学读书,分担家里的生活压力,根本没有奢望长久立足海派文化的土壤,竟然有一天成了上海的外来媳妇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出生于山区一个多子女家庭,共有四弟妹,我是老大,与最小的妹妹相差10岁。九华山在我们池州市下辖的青阳县境内,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。我家世居的小村庄藏在大山里,离九华山不远。年幼时,父母从未带我去过这座千年名山,由于清贫度日,拿不出日常开销之外的钱购一张门票。读初中时,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,我家里大人一起出动挖野山笋,然后由爷爷挑着几筐新鲜的笋赶集卖钱,凑够一路上自备的茶水、糕点等物品,才报名参加春游活动。虽靠近九华山,每一步路都得花钱,没有给周围村庄里的人带来额外的经济收入,不像现在的景区周边共享文旅特色产业链成果,百姓从溢出效应中有所获益。

初中毕业,我在家里一边带弟妹,一边烧饭及料理家务,让父母放心地出门种地。眼看弟妹一个个到了上学年龄,我倒是闲了,但家里的支出越来越大。那时,家里分到了承包山里的田,我学会了种地,一家人出力勉强糊口。一到过年前夕,村庄里有几对中年夫妻及一些未婚的年轻打工仔,有的从苏州、昆山,有的从浙江、江西,远的从新疆和广东回家过年,他们带回服装、鞋子、电子产品等各种时髦货,村里男女老少人人羡慕。有一天吃晚饭时,闻见父亲感慨,一大家子人,他是走不出家门了,这钱该是年轻人赚啊。我暗想父亲这话是什么意思?家里弟妹多,一张嘴就要吃东西,一只书包就得装钱,还有爷爷奶奶两位老人需要照顾,思来想去只有我这个年轻人迈步出门了。于是,我提出过完年跟他们去打工,不管去哪里,总比待在村庄里闲散,守几亩山地强。母亲说,你一个小姑娘走出山地干什么,城市里不是种庄稼,马达一响,机器转动,你能喂它一颗玉米粒,还是一根红萝卜?父亲缓缓地说,阿婉,你要是小伙子,我早催你出去了,哪怕只赚一份将来讨老婆的彩礼钱,可女孩子进城打工碰到点糟糕的事,怎么办?我不放心啊。然而,我已经决定走出大山,看看外面不一样的世界。

◆隔壁村的春霞姐与她老公,原先在浙江宁波打工,那年过完春节,要去上海碰碰运气,即便找不到工作,就当见见大上海的世面,再返回浙江也不迟。我和春霞姐有点亲戚关系,想跟她去江南寻活干。她二话不说愿意带我一起出门,只是嘱咐一句,打工不是钻山洞玩耍,生活做不来、做不好、做坏了,要处罚、赔钱、开除。我一听小腿肚直发抖,不过没被吓退,待了一会儿说,春霞姐,你怎么做,我就跟着学,人家能拿工资,俺就不行了?

离别老家,我们一行出发了。当初哪里会想到这次离家打工,究竟意味着什么,潜意识中可能有一份工作,赚点钱供弟妹上学,过几年回家相个亲,嫁个男人生儿育女,在大山里种庄稼,饲养家禽,像长辈们一样过日子。乘上长途汽车,五六个小时就到了上海,比我想象的要近得多,哪像村里其他人到广东或新疆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。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,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(图文无关)

口述:阿婉 文字:丁惠忠

三十年后,我成为了上海人

踏上上海的土地,瞧一眼四周高楼林立,车辆穿梭,人来人往,一派繁荣景象,哪里来得及欣赏大都市风光。我们先寻了一家街道小旅馆,将行李放下,就马不停蹄地钻进小弄堂,或者沿着马路寻找工厂。那个时候一批知青都返城了,有些人在街道小厂干上二三年就忙着自己创业,还有嫌小厂工资少,干脆去国外打洋工,给我们外来工留了机会。很快我们找到一家电子厂,加工五金之类配件,用电烙铁将电线线头焊接到制板上,正负极测试通了,这环节就算结束。工作不用花多大力气,一个班次几个动作重复上千、上万次,时间一长,就感到特别无聊。但有一点十分满意,免费住在厂里几间仓库改成的宿舍里,可省下一笔钱,抵得上解决我一个妹妹的生活开销。隔月发了工资,除留下生活费外,全部寄回老家。当我收到弟弟妹妹装在一封信封里的信件时,那一页页歪歪斜斜的字迹,一声声姐姐你辛苦了,我感到很欣慰。

◆半年后,春霞姐和她的老公跳槽到松江一家大厂,由于招工人数限制,我没有跟去。很快厂里有人填补进来,其中一个从郊区来的小伙子阿彬,被分到我一个班组。阿彬中等身材,皮肤白,看上去没吃过苦,是个自来熟的人。可能是郊区人,阿彬起初说话还带点方言,二三个月工作下来,见他跟厂里爷叔、阿姨聊天完全听不出郊区口音了,满口是上海话。记得一个休息日,阿彬邀请我去城隍庙,并说我的老家九华山寺庙众多,但阿拉的城隍庙老好白相的。其实那时我已经听得懂白相就是玩的意思,阿拉就是我们,其他上海话还真的不明白。乘这次机会,我说,阿彬,你教我上海话吧。谁料到,阿彬不仅教我上海话,还教我他所在郊区那个小镇上的方言。

你一定猜到了,自此我成了阿彬的女朋友,一年后,我嫁给了他。

在小镇上,我公婆只会说本地话,不太会讲普通话。我怀儿子时,阿彬仍在那家电子厂上班,我辞职待在家里,有时帮婆婆在宅前自留地小菜园除除草,挑几棵蔬菜,同时跟着学习当地语言。我生下儿子后,阿彬不在电子厂上班了,回到小镇租了一间门面房开维修店,修理电视机、收音机,到后来各种家用电器都会修了。儿子稍大点,镇上的企业多了起来,我参加了招工进了工厂,一边上班工作,一边跟着公婆种地。那时我的户口还不满时间要求没有迁到上海来,划不到责任田,我想儿子一天天长,要是有一块自己的责任田多好啊。在娘家,我就会种地。现在

结婚过日子嘛,如果有一块地,种上喜欢的庄稼、瓜果、绿叶蔬菜,那是很开心的事,这是大都市里的村庄,是城市的稀缺资源,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很有价值的,完全不同于我老家大山里的田地。尤其每次听见婆婆跟公公念叨,要去西民沟张家宅后院或南河沿种花地,那“花地”两字,我原以为种植什么花卉,等它长大成型了要去卖钱。其实不是的,“花地”是当地的土话,就是“庄稼”的意思,字里行间真是美到泥土里了。

后来我的户口迁来了上海,村里调剂给我一块杂边地,尽管只有一亩,本来村里人多地少,也算认可我这个外来媳妇。私下里,这块责任田,我更多看作是精神上的立足之地。

不过有一点始料未及,可能是厂家生产的家电质量越来越好,阿彬的维修生意不灵了,很多人家手里有了钱,一旦家电坏了觉得修理花的钱不划算,直接购买新的。阿彬重新应聘到市区工厂工作,由劳动合同制转为正式职工,凭借一技之长担任了车间主任,并且入了党,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。儿子一路成长,考取了上海建筑类大学,毕业后从事建筑施工与设计工作。

◆这个小镇上流行一句俗语叫“三十年媳妇熬成婆”,比较符合我的情况。我觉得这不是一句贬义的话,于我而言是人生的一段经历。比如,我嫁给阿彬,娘家没有要一分钱彩礼,我也没有任何嫁妆,简简单单办了几桌酒席,邀请娘家一家人来上海,就把婚结了。这几十年来,我完全融入了这个大家庭,学会了沪郊小镇的本地方言,还会说一口蛮标准的上海话。家里公婆传下的两间平房,我和阿彬翻建了一幢楼房,在市区,我们帮儿子付了首付,买了一套婚房。目前我虽到了退休年龄,仍被镇上企业领导留下继续工作,等哪一天儿子一家有了孩子,我可能去市区当全职奶奶了。我娘家那边,山区的风貌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,道路也宽敞了,弟弟妹妹不用我经济上给予支援,乡村生活美满富足。

如今,我看到儿子的成长,其实也是自己的成长,那漫长的过程里包含着对于幸福生活的希望与追求。每一段岁月,都会有“老中青”三代人的互相托举,才能一步步走下去。三十年前,我哪敢想成为上海人,哪知道那里竟然有亲人等待着我,使我拥有了一个新的故乡,新的生活。